



引用格式:季乃礼,李赫楠.从政治认知视角看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74-82.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74-09

从政治认知视角看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

Trump's personal traits and leadership style from a politic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季乃礼¹,李赫楠²

Ji Naili, Li He'nan

1.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2.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从政治认知视角出发,以玛格丽特·赫曼构建的领导风格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账号所发布的反映个人心理活动与认知动态的文本信息进行内容分析,探究特朗普的个人特征与领导风格,发现:面对环境限制,特朗普属于挑战环境型领导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事件发生并需要权力挑战现存限制,也将尽可能地推翻他所处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限制;在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方面,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自信程度非常高,而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自信特征比概念复杂性特征更突出,对信息接受往往是封闭的;在驱动动机方面,特朗普的内群体偏见很高,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同时他对潜在对立者极度不信任,对别人的批评高度敏感和警觉,不允许他人挑战自己的权威,他更倾向于相信国际环境中损害自己群体利益的邪恶对手到处存在,自己有义务对抗这些敌人,必要时应主动攻击以消除潜在的威胁。由此可见,特朗普的领导风格是典型的改革者类型,相比于意识形态利益,其改革的价值取向更偏向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关键词:

领导风格;
决策特征;
政治认知;
特朗普

[收稿日期]2019-03-02

[作者简介]季乃礼(1970—),男,山东省高青县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学说和政治治理;李赫楠(1996—),女,湖北省十堰市人,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政治心理学。

唐纳德·特朗普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总统。比起政治家,特朗普更像是一位演技娴熟的商业大佬,展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派”风格。从竞选活动开始,特朗普就集中对经济、移民政策、奥巴马医改、反恐等议题加以阐释,虽多次挑战在美国政坛上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政治正确”底线,却意外赢得众多选民的支持,支持率一路攀升。执政以来,特朗普对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大刀阔斧、强势推行一套单边主义的政策,引起国际社会和美国精英阶层的普遍担忧。从竞选总统开始,到出乎意料赢得总统选举,再到孤注一掷地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这位不羁善变、作风大胆的新任领导人个性极为鲜明、令人捉摸不透,既吸引了众多关注,也引来不休的争议与揣测,为美国政治与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带来了诸多变数。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学者把特朗普的出现定位为粹主义^[1-2],用“反常”来形容特朗普现象,认为特朗普主义即是“反智主义”“反建制主义”“反自由主义”^[3-6]。基于这种判断,学者们认为他可能以美国的利益为重,奉行新孤立主义^[7-9]。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一种常态,他代表的是保守主义、共和党建制派^[10-11]。因此,另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甚至是“低开高走”^[12-13]。

尽管学者们对特朗普的认识有分歧,但是大家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定性的文献研究方法。而运用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研究特朗普的文章相对较少。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只有极少数学者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例如,有学者运用五大人格以及自恋等理论分析特朗普的心理^[14-15],有学者对其政治人格进行研究^[16]。但是没有学者从当前政治心理学的主流理论——政治认知理论——进行分析。

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认知视角出发,以玛格丽特·赫曼(Margaret G. Hermann)构建的领导风格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特朗普所发布的反映个人心理活动与认知动态的文本信息尤其是其“推特”(Twitter)上的内容的分析,探究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论证领导风格理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普适性,以期弥补学界在特朗普政治认知研究上的空白。

一、赫曼的领导风格理论

随着“政治认知”概念和理论的问世,有学者专注于政治认知的视角对领导风格进行研究,玛格丽特·赫曼就是其中的代表。多年来,赫曼与同事发表了多篇文章对领导风格进行探讨,并把领导风格作为一个连结领导人个体特质与决策行为的中间变量,从政治认知视角对不同政体下领导人的个人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

赫曼认为,不同领导人之间领导风格的差异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领导人如何应对他们所处环境中存在的限制,看他们是尊重抑或是挑战这样的限制;二是领导人对接受输入决策系统信息的开放程度,看他们是有选择地使用信息还是任由完全开放的信息指导他们的决策;三是领导人追求地位的原因,看是来自自身内部的推动力还是来自外在人际关系的推动,在决策时是考虑问题本身还是出于照顾人际关系的需要^[17-19]。领导人个体特质与领导风格的对应关系见表1。

二、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分析

本文从对环境限制的反应,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和驱动动机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特朗普的个人特质。

1. 特朗普对环境限制的反应

领导人如何应对环境限制?是尊重环境还是挑战环境?在赫曼的理论模型中,评估领导

表1 领导人个体特质与领导风格的对应关系

领导风格	对环境限制的反应	对信息的开放程度	对领导地位追求的动机	
			考虑问题的取向	人际关系处理方式
改革者	挑战	封闭	扩张主义者 (重点是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 例如卡斯特罗)	传道者 (重点是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信息(意见、行动), 并投身其中, 例如霍梅尼)
		开放	积极的独立者 (重点是保持一个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同时回避尝试限制两者的障碍, 例如阿萨德)	警察式 (专注于实现自己的议程, 通过参与其他进程, 说服他们采取行动, 例如恩克鲁玛)
战略家	尊重	封闭	发展者 (在规范和规则之下工作, 强调个人指导, 使政策沿着与自己意见一致的路径前行, 例如戴高乐)	彼此影响者 (重点在于监测其他重要人物是否支持, 或不积极反对, 他们想在特定的情况下做什么, 例如克林顿)
		开放	调停者 (重点在基于问题的性质与目前的情况, 评估什么样的选择或行为是可行的, 并考虑重要的选民将支持什么样的行为, 例如布什)	机会主义者 (重点是协调分歧和建立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授权于他人并共同分担责任, 例如拉夫桑贾尼)

注:根据 Margaret G. Hermann 的研究整理而得

人面对环境限制所作出的反应,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控制事件发展的自信,二是对权力的需求。

(1)控制事件发展的自信

相信自己拥有控制事件发展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影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领导人,对决策和执行过程有着较强的控制欲,为了确保事情会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进行,这类领导人常常会要求突击检查下属正在做什么,要求执行者与他的个人行动方向保持绝对一致;同时这类领导人还会主动发起政策活动而不是等待别人提出决策议程,一旦他们做出决定,很难妥协或与他人达成交易。而那些不认为自己能控制所发生的事情的领导人,行事风格则截然相反:他们更愿意下放权力,希望其他参与者共同履行权职;同时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多是静静等待议程的提出而不太可能主动出击。

虽然特朗普是一个政治新人,旁人难以过多观察到他作为政治领导人参与政治决策的种种细节,但他作为美国著名的房地产大亨,已在聚光灯下生活了数十年。从执政表现、自传表

述和人生经历来看,特朗普表现出对自身控制事件发展能力的极强自信。特朗普对事件发展的各过程都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从刚上任即开除检察官和驻外大使,到执政未满一年便辞退数十名白宫团队重要成员,特朗普对于同僚和下属与其政策主张保持一致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希望决策与执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从特朗普在经商时期吸纳的伙伴也可以看出,成为他麾下一员绝不是靠人情而是靠能力,必须与他的观点保持一致才能够成为他的合伙人和员工。特朗普对主动发起政策活动有着强烈意愿。在竞选活动中,特朗普提出了“将工作从中国等国家带回美国”“在美墨边境筑墙”、废除奥巴马医改、阻止外国穆斯林入境等极端却鲜明的主张。这些政治口号虽或多或少出于选举的需要,但他所提出的各种反传统的政策理念,诸如美国战略收缩或重新布局、限制移民美国等,均非虚张声势,上任不过十天就毫不顾忌地挑战“政治正确”,发表了要求美国暂停难民接收程序 120 天的行政命令,无视国内的各种反对声音。仅此足见特朗普的雷厉风行、自主性相当强的执政风格。

(2) 权力需求

对权力的需求也反映了领导人对于建立、维持或恢复自身权力的担忧,换句话说,对权力的需求也是领导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欲望。

当领导人表现出高度的权力需求时,他们善于审时度势,能清晰感知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追随者大多是他们达成最终目标的工具;他们建立规则是为了确保规则的改变符合他们自身变化的目标或利益。当领导人对权力的需求较低时,他们满足于成为几个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对这样的领导人而言,授权于他人很重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也非常享受与他们的追随者建立信任关系并分享责任与义务的感觉,这类领导人更像是特殊集体的利益代理人,代表着集体在决策方面的利益。

依据权力需求的评判标准,特朗普表现出高度的权力需求。

特朗普经常发表有攻击性的强力言论。以2016年9月20日—11月7日期间为例,总统竞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特朗普个人“推特”账号的386条动态中,从对于不同群体的指责,到他对于政客及其制度体系的猛烈批评,攻击性言论有241条。尤其是在三次总统辩论期间,他对主要政敌希拉里的攻击更是达到高峰,从其丈夫克林顿的生活、希拉里“邮件门”、任职国务卿时期的不作为,到指责其“培养”了伊斯兰国等,全方位进行攻击;同时不忘指责媒体对其持有偏见,故意拉低他的选情民调。可以说,自参政以来,特朗普做出有强力攻击倾向的举措相当频繁。同时,特朗普还非常善于审时度势,知道采用什么样的策略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从事房地产经营期间,从地产选址到营销,再到装修设计,他不仅凭借独到眼光在商业竞争中屡战屡胜,更是喜欢由自己“创造或变更规则”,以换取更优越的利己条件。因此

可以说,特朗普有着强烈的控制或影响他人的欲望,对权力也有着较强的需求。

综合特朗普对自身控制事件发展能力与权力影响的评估,可以得知,特朗普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控制事件发生。面对环境限制,特朗普属于挑战环境型领导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事件发生并需要权力挑战现存限制,也将尽可能地推翻他所处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限制。他对决策过程更感兴趣也更积极,并愿意为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

2. 特朗普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

领导人是有选择性地使用信息指导决策还是完全开放地使用信息指导决策?在赫曼的理论模型中,自信与概念复杂性的相互关系影射着一个领导者的自我定位,这种自我定位暗示着领导人的开放程度。因此,关于领导人信息接受程度是开放还是封闭的判断,便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自信程度,体现在领导人对自我重要性的感知;二是概念复杂性程度,体现在领导人在描述或评论他人、政策、观念或事件时观察角度的细分程度。

(1) 自信程度

自信折射出领导人对自我重要性的认知,它将直接影响领导人的决策行为。缺乏自信的领导人更容易受周围人意见的影响,缺乏对自己提案重要性的客观认知,对他们来说,从他人的看法中知道自己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得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倾向于成为政治团体的代言人或是代表,不断搜寻信息来提高决策自信,提高自我满足感。对自信程度的测量,主要是测量代词 my, myself, I, me, mine, 计算它们在领导人个人言论中出现的次数。这些词可能用于领导人行为主语,或是领导人把自己看作某个事件中的权威人物、积极回应的接受者。依据对自信的测量标准,笔者对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个人言论进行了统计。

2016年5月—2018年1月20日,特朗普共发布了3478条推特。其中,自2016年5月特朗普实际上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到2017年1月19日正式上任前,特朗普共发布了1381条推特;2017年1月19日至2018年1月20日,执政一年的特朗普共发布2097条推特。就推特内容而言,特朗普使用第一人称代词 my, myself, I, me, mine 的情况见表2。

就代词 my, myself, I, me, mine 出现的频率来看,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对自我重要性的感觉远比其他个体要强烈。但有意思的是,从数据分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上述代词的使用次数有所下降,对自我意识、自我重要性的感觉较之以前似乎有所弱化,但依旧处在一个较高水平。

不仅在推特发布数据中,在相关事件中也随处可见特朗普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我重要性的认知。例如,特朗普将自己的名字印刻在了所有的个人品牌上,从球场到酒店,从赌场到学校。Gwenda Blair 在她关于特朗普家族三代人的传记《特朗普家族》中更是直接写道:“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主格 I,宾格 me 和 my,远远超过 he 和 his。”

由此可见,特朗普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对自我重要性的感觉远比其他个人要强烈,可以说他是一个高度自信的人。

(2) 概念复杂性程度

概念复杂性是指领导人在描述或评论他人、政策、观念或事件时观察角度的细分程度。概念复杂性程度较高的领导人,会倾向于从广

表2 特朗普使用代词 my, myself, I, me, mine 的情况

时间	出现	出现
	次数	频率/%
2016年5月1日—2017年1月19日	523	37.87
2017年1月19日—2018年1月20日	546	26.04
2016年5月1日—2017年10月31日	1069	30.74

泛的信息中寻求各种观点;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的领导人,会更相信他们的直觉,因此他们认为,行动远远比思考、计划或寻找更多信息要更有效。

对概念复杂性程度的测量,重点也放在特定单词的使用情况上,这些词暗示说话者可以看到环境中的不同维度,而不是表明说话者只看到少数几个类别来分类对象和思想的词。表现发言者高复杂性的常用词有: approximately, possibility, trend, for example; 而反映发言者低复杂性的常用词有: absolutely, without a doubt, certainly, irreversible。

依据概念复杂性的测量标准,笔者对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个人言论进行了统计。在特朗普发布的上述3478条推特里,高复杂性常用词与低复杂性常用词的使用情况见表3。

就表示概念复杂性常用词出现的频率来看,特朗普是一个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的领导人,他倾向于对物体和想法进行简单分类,对环境复杂性的感知是模糊而有一定困难的,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在他看来,行动远远比思考、计划或寻找更多信息要更有效。从数据分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低复杂性常用词使用频率比就任前更高,高复杂性常用词的使用次数随着执政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但总体来说,特朗普在推特中对表示概念复杂性词语的使用较少。

(3) 特朗普的自信、概念复杂性与信息开放程度

表3 特朗普使用高复杂性常用词与低复杂性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高复杂性常用词		低复杂性常用词	
	出现	出现	出现	出现
	次数	频率/%	次数	频率/%
2016年5月1日—2017年1月19日	2	0.14	8	0.58
2017年1月19日—2018年1月20日	13	0.62	17	0.81
2016年5月1日—2018年1月20日	15	0.43	25	0.72

通过对表 2 表 3 的数据比对,我们发现: my, myself, I, me, mine 的出现次数是概念复杂性常用词出现次数的 26.73 倍;在概念复杂性常用词中,低复杂性常用词出现次数是高复杂性常用词出现次数的 1.67 倍。综合对特朗普自信程度与概念复杂性特征的评估,可以得知,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自信程度非常高,而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自信特征比概念复杂性特征更突出。对照自信特征、概念复杂性与信息开放程度的关系可知,特朗普对信息接受往往是封闭的。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应该发生,他对信息的收集与寻找是为了论证自身对政治情境的定义与理解的正确性,以说服他人相信并支持自己的主张与行动方针。特朗普对环境线索是相当不敏感的,他更倾向于重新诠释所处的环境以迎合他所提倡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对他自身观点不利的数据和证据将被刻意忽略不计。在决策与信息收集过程中,特朗普更有可能以分层的方式组织决策与信息收集,以确保自身对决策过程的控制权。

3. 特朗普的驱动动机

对领导人自身权力地位追求动机的测量,可以看出领导者是受到他所感知到的威胁或问题的驱使,还是受到合作关系的驱使。测量结果可划分为两类:任务趋向和维系群体趋向。

在动机评估的过程中,具体用以下 3 个特征来进行测量:任务趋向、内群体偏见和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任务趋向的焦点所在折射出领导人寻求权力地位的动机,内群体偏见和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反映出领导人对特定群体的认同程度。

(1) 任务趋向

所谓任务趋向是指领导人寻求自身权力地位的动机。对任务趋向的测量,就像对概念复杂性的测量一样,重点放在计算特定的单词表达,区分这些表达是表示对工作任务的完成,还是关注对他人情感的回应与维系。反映任务趋

向性的词有 accomplishment, achieve, achievement, plan, position, proposal, recommendation, tactic 等;反映维系群体趋向性的词有 appreciation, amnesty, collaboration, disappoint (ment), forgive(ness), harm, liberation, suffering 等。

依据对任务趋向的测量标准,在特朗普发布的上述 3478 条推特里,任务趋向常用词与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使用情况见表 4。

就反映寻求权力地位动机常用词出现的频率来看,自特朗普正式进入总统竞选的最后角逐以来,任务趋向常用词的使用频率是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的使用频率的 2.9 倍。从数据分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任务趋向性基本稳定,维系群体趋向性有所提升,对众人愿望与需求的敏感度进一步提高。可以说,特朗普是一个任务趋向性更强的领导人,他对权力地位的追求动机来自于自身内部,源于特定的问题或原因,如意识形态、特殊利益等。特朗普也更倾向于从问题的角度看世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会不断对一个项目进行深入挖掘,了解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案,他甚至愿意牺牲团队中高昂的士气来完成任务,会努力实现任何所做出的决定。

(2) 内群体偏见

内群体偏见是指领导人对所属的群体有强烈的情感依赖,在看待世界时以自己的群体(社会、政治、种族)为中心,认为这个群体是最好的。在内群体偏见较高的领导人看来,保持

表 4 特朗普使用任务趋向常用词与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任务趋向常用词		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	
	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2016年5月1日—2017年1月19日	46	3.33	10	0.72
2017年1月19日—2018年1月20日	71	3.39	30	1.43
2016年5月1日—2018年1月20日	117	3.36	40	1.15

群体文化的完整性和地位的崇高性有重要意义,他们做出的任何决定都要符合这个群体的核心利益。

反映领导人内群体偏见的词,包括有利的正面修饰语(如 great, peace-loving, progressive, successful, prosperous),展示强力的词语(如 powerful, capable, made great advances, has boundless resources),或者表明需要维护集体荣誉和身份的词句(如 need to defend firmly our borders, must maintain our own interpretation, decide our own policies)。

依据对内群体偏见的测量标准,特朗普发布的上述 3478 条推特里,反映内群体偏见常用词的使用情况见表 5。

可以说,特朗普是内群体偏见很高的领导人,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高度关注并提防其他群体、组织、政府或国家干预或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企图。特朗普很有可能使用“替罪羊”政策,将感知的国内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美国本土人民以外的外来者,并通过放大这个外部威胁来调动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内群体偏见极强的特朗普把政治看作是零和游戏,把对方群体的收益看作是美国民众群体利益的损失。因此,他认为美国人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确保美国人民在全球竞争中稳赢不输。

(3) 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

对他人的不信任包括对他人的怀疑、不安、疑虑和小心,怀疑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倾向。

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的测量,重点放在对语句的理解上,领导人是否对于另一些个体与群体在做什么感到怀疑与不安,甚至对他们保持警惕?领导人是否关心这些人或群体在做什么

么,并认为这些行为对自己、盟友、朋友不利?如果其中有一个条件存在,则语言表达中就表现出对他人的不信任。

据粗略统计,在上述时间段,即 2016 年 5 月到 2018 年 1 月 20 日期间的 3478 条推特中,特朗普谴责国内舆论媒体,攻击希拉里、奥巴马,以及其他政见立场相左者的有 811 条,表现出对潜在对立者的极大不信任,高度怀疑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倾向。同时特朗普表现出对别人批评的高度敏感性和警觉性,从记者到政治对手,特朗普称他的反对者们“令人恶心”,并且贬低他们是“失败者”,近乎锱铢必较,他的权威不允许被挑战,批评和反对在他看来就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综合对特朗普内群体偏见和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的评估,可以得知,特朗普的内群体偏见很高,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同时他对潜在对立者极度不信任,对别人的批评高度敏感和警觉,不允许他人挑战自己的权威。

对照内群体偏见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可知,内群体偏见很高同时极度不信任他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相信国际环境中损害自己群体利益的邪恶对手到处存在,自己有义务对抗这些敌人,必要时应主动攻击以消除潜在的威胁。

三、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分析

基于对特朗普如何应对环境限制、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与追求地位原因动机这三个方面问题的测量,可以看出特朗普对政治背景和环境敏感与否以及敏感程度,与他是想控制事件的发生还是想成为他人政治观点的代言人有关。根据赫曼的领导风格分析框架,这些不同的差异组合起来,即可看到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即典型的改革者类型。

如何看待“特朗普是改革者”的结论?我们或许可以将特朗普与赫曼所说的典型的改革者作比较。1970 年代,赫曼的研究团队通过远

表 5 特朗普使用反映内群体偏见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2016 年 5 月 1 日—2017 年 1 月 19 日	234	16.94
2017 年 1 月 19 日—2018 年 1 月 20 日	684	32.61
2016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1 月 20 日	918	26.39

距离人格评测法对 62 位国家领导人的领导风格做出评测,在赫曼团队的数据库中,改革者类型领导风格的代表性领导人有两位,分别是古巴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说同是改革者,回顾 3 位政治人物的生涯却是大相径庭。但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撒切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坚定的,并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

卡斯特罗曾经说:“我的愿望一直是忠于职守直至最后一口气。这是我能给予的。我并不是向你们告别。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作为一名思想战士进行战斗。”^[20]半个世纪以来,卡斯特罗就像与风车搏斗的堂·吉珂德,他的一生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为了在古巴建立自由平等、没有剥削、生活富足的理想社会,他横冲直撞,无所畏惧。从悍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到排除万难建立社会主义政体,卡斯特罗对国家统治权力与统治地位的追求动机全部来源于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苏联解体后,卡斯特罗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环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中发表见解,猛烈批判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与帝国主义势力。休养之际的卡斯特罗也时常在报纸撰文,谈论革命和理想,关心科技发展,呼吁世界和平,并始终不忘究其一生奋斗的主题、目标:追求各民族、各阶层的真正平等和自由,以及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

撒切尔夫人同样有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她是反共产主义的。自步入政坛起,便不曾掩饰其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和仇恨。尤其是在 1975 年 2 月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后,她更是毫不隐讳地批评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绥靖政策,宣扬自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作为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联合美国前总统里根、罗马教皇保罗二世、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科尔等西方右派领袖,一起构筑起一道坚决对抗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战线。撒切尔夫人终生反对共产主义,直到去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她仍然坚持说:“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由此可见,她身上极其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一直没有改变^[21]。

与前两位改革者相比,驱使特朗普行为的主要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作为一个稳居全球富豪榜的超级资本家,特朗普无论是团队组建抑或是推行的政策议案,都带着浓厚的商人色彩。从执政团队建设来看,特朗普内阁的核心智囊团是以华尔街金融大亨和企业家为主的商人团队——质疑全球变暖的前美孚集团 CEO 雷克斯·蒂勒森、支持放松金融业法规的前高盛合伙人史蒂芬·努钦、民粹主义者代表史蒂夫·班农、人称“破产重组大王”的威尔伯·罗斯等。商人智囊团队的建立与“美国利益至上”的政治口号遥相呼应。

在 2017 年 1 月 20 日的就职典礼上,特朗普曾多次高喊“America First”的口号,以“美国利益至上”的标准来衡量国际和国内政策。围绕着“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基调,特朗普提出系列政策预想并逐步落实:颁布禁穆令,减少难民接受人数;用“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取代奥巴马的“气候行动计划”,退出《巴黎协定》,为国内自然能源的开采开启“绿色通道”,希望以此实现能源自主,摆脱 OPEC 以及对那些于美国利益有害的国家的依赖,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重启“双边协定”,与各国重启贸易谈判,拒绝有损美国利益的贸易协定,计划提高进口货物关税、打贸易战,以此保护美国企业、增加收入和支持美国制造,进而扭转贸易逆差;大力

推进税制改革,将公司所得税从35%下调至20%,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将个人所得税从七档减至四档……

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价值取向的确贯彻落实了“美国利益至上”的竞选口号,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经济利益至上”的口号——战略利益要远比意识形态利益重要。因此,尽管从领导风格上来讲特朗普是改革者,但他是另类的改革者。

回到最初学者们争议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对特朗普来说,利益至上是他奉行的行为标准。奥巴马政府乃至以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在顾及美国利益的同时,还能够用意识形态的标准调适国家间的关系,而特朗普则是将“美国利益至上”推到极至,这看似反常,但是从顾及美国的利益来看,则并不反常。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特朗普总是会打出更多张牌,以争取更多的利益,可以断言,双方得失的较量不会导致中美关系改善太多。

参考文献:

- [1] 陶文钊.“特朗普现象”剖析[J]. 国际关系研究,2016(6):3.
- [2] 段德敏. 英美极化政治中的民主与民粹[J]. 探索与争鸣,2016(10):76.
- [3] 金灿荣,金君达. 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新常态”吗? [J]. 当代世界,2016(4):22.
- [4]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4):31.
- [5] 肖河. 美国反建制主义和特朗普政策[J]. 国际政治科学,2017(2):62.
- [6] 周雷.“特朗普主义”与专制的显现[J]. 南风窗,2016(23):67.
- [7] 袁征. 必须面临的挑战:特朗普当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J]. 中国投资,2016(23):32.
- [8] 贾庆国. 大选后的美国与世界[J]. 群言,2016(12):16.
- [9] 王栋,孙冰岩.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前瞻[J]. 现

代国际关系,2016(12):15.

- [10] 郇菁. 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特朗普政权的未来[J]. 文化纵横,2016(6):54.
- [11] 孙来斌. 从大选看美国政治的问题、形象和走向[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5.
- [12] 张蕴岭. 亚太:安全上有对峙无对抗,一体化进程反转[J]. 世界知识,2016(24):16.
- [13] 马文生.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J]. 公共外交季刊,2016(4):70.
- [14] MCADAMS D P.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narcissism, disagreeableness, grandiosity—A psychologist investigates how Trump's extraordinary personality might shape his possible presidency [J]. The Atlantic Monthly,2016(6):76.
- [15] BETH A V, ANGELA S B, ANTHONY V. Is hillary dishonest and Donald narcissistic? A HEXACO analysis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public personas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6(10):281.
- [16] 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 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7(2):15.
- [17] MARGARET G H, CHARLES W K. 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5(4):511.
- [18] HERMANN M G.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trait analysis [M] // JERROLD M P.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ill Clint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178-212.
- [19] HERMANN M G. Leadership styles of prime ministers: How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ffect the foreign policymaking process [J]. Leadership Quarterly,1998(3):250.
- [20] 卡斯特罗. 总司令的思考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
- [21] 朱继东. 还原真实的撒切尔夫人: 终生反对共产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 [J]. 红旗文稿,2013(9):33.